

“至善乃挣钱”的现代社会困境 与“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



儒商是具有儒家理论修养及天下情怀，同时具有市场创新精神的熊彼特意义上的二十一世纪企业家。

二十一世纪儒商阶层的建立和出现实属不易。但也许，恰恰是因为二十一世纪的儒商正好既承担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英雄”角色，因而是国际的，指向未来的，又在儒家伦理回归方面承担现代性构建、普世性解释的“中介”角色。因而，儒商在二十一世纪可能会是体现人类进步的希望所在，是那个终能到达彼岸的先行者。

A 从近现代经济哲学看西方商人的概念

最近“土豪”这个词很流行。曾经有人采访我问我怎么看，我说这个“土豪”和过去的“土豪”不一样。过去是一种被掠夺的对象，是革命的对象。现在是幽默的，中国政治式、文化式的幽默。但确实中国处在一个“土豪”的阶段。我有时候也说我是一个“土豪”，因为我们还未被现在的企业伦理驯化。但我认为，要走出现代企业伦理出现的诸多困境，仅有“土豪”是不够的，因为“土豪”本身就是这种困境的一部分。

杜维明老师谈到“儒商”，“用今天的话说，儒商就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请注意，他没提商人，是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而且有公共意识的一批知识分子。”做到这个特别难，要做到杜老师说的这个标准，就差不多成为上帝了。我的看法是，“儒商”时代该是贵族气质。这个贵族气质在中国社会是特别缺乏的，中国从来没有贵族，都是奴隶，或者奴才。所以，贵族气质在中国是要担当、要承担、要谦和、要平民化。这是中国社会当下极度缺乏的资源。

B 从哪里来？“儒商”的来路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社会企业家就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中坚力量，这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那什么中国的“儒商”呢？“儒商”是个既古老又特殊的概念。除了子贡之外，我不太认为以前的社会有儒商阶层存在。子贡是孔子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经孔子教导，他从“贫而不谄，富而不骄”上升到了“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给今天的我们树立了儒商典范。当然，我觉得春秋时期，是存有市场经济因素。但是，到后来，商人的地位日渐低下。为什么？因为国家经商了，商人们只能靠官商勾结而谋生了。后来的商人有的可以称为“士”，“士为知己者死”，为谁死？为皇帝死。皇帝今天宴请我，我明天跳江都行。为什么？因为他仅有依附关系，这个时候就没有市场的概念。中国的商人从来没有独立过，即便你同时可能有知识分子情怀。为什么？因为你靠体制分一杯羹给你。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伟大的“九二南巡”真正把市场经济引进来的时候，中国的商人才有了自己的些许地位。

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市场概念，是被动的积极的历史姿态，中国接纳了现代性进程，产生了具有市场意义的商人阶

我想，必须先西方角度来讲一下关于西方商人的概念。我先从现代性讲一下。尼采把“上帝”杀死了，他说的是“毁灭性创新”。尼采特别爱讲“毁灭”，为什么？因为他从现代性判断，认为西方社会已经走入虚无主义，让他失望透顶。所以他希望“超人”出现。从而，他在政治信念上主张“贵族激进主义”，怀有道德优越感及有“天职”的使命感意识，坚信“我一定要当毁灭者”。目的是什么呢？是“超人”，期待“超人”的出现拯救人类。

海德格尔也同样表达了对现代性的不满，他说：“我认为技术的本质就在于我称为座架的这个东西中，座架的作用：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由此，他十分悲观地感叹：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无家可归的状态实基于存在者之离弃存在。无家可归是忘在标志。”准对此做出了补充回应呢？马克思·韦伯。他认为：“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创立。”因而，资本主义精神与启蒙的主旨理性化合为一体。他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结合后的体现为：

层，我也戏称之为“土豪”。但到现在为止，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要寄希望于新的改革。

所以这是儒商面临的挑战。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像我这样一大批的人，从机关走了出来，我们这些人受到过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而且经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愿意回头探讨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样的人才去做了商人。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其实是基尼系数上来看，我知道现在贫富差距最大的是中国香港，再一个是美国，中国内地还不算贫富差距最大的。所以现在是全世界人类出现了贫富差距极大的现象，这带来的就是我称之为“全球性的现代性困境”，谁也逃不了。全球化、现代化，最后都要走到现代性困境里来，在中国的当下表现得非常充分。“92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体制脱离，进入到市场，成为具有创造性破坏意义的革命情愫，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企业家精神释放。至此，完成财富积累的这代企业家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社会的现代性困境产生的危机感、贫富差距的背景下的革命情愫，成为超越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承担成为企业家开始考虑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兼具传统知识分子道统任务及市场创新任务的儒商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精英身份，同样成为稀缺资源。

至善就是挣钱，职业乃是天职，必须为之尽责的义务感。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实际上，到此为止，资本主义的商人的合法性得到了确认，也暗合对尼采、海德格尔的“超人”及“上帝”出现的回应。

到了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那里，尼采的“超人”经马克思·韦伯终于出现了。这就是具有新教伦理精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家。熊彼特认为：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是社会的创新行为，可以形成新的经济能力。由此，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实现新组合为本职的人称为企业家。他指出，“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仅是他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动机来自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包括建立私人王国、对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和坚强的意志。”要做到这样的“精英”行为，企业家必须具备预测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说服能力。大家看看，到了这里，我们就找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秘密，也看到了现代性终于培育出了时代的“超人”与“上帝”。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稀缺资源。

总结一下：当我们探讨了西方企业家的前世今生后，是不是可以试着肯定，今天我们所谈的儒商，从商的部分其实来自于熊彼特所总结的企业家精神。改革开放后，一代企业家在西方企业管理理论教育下出现，一个重要特征是竞争意识越来越强，狼性越来越足，具备了十足的经济动物特征。市场意识趋利性以及对抗制环境的渴求与依赖与西方企业家并无二致。这是所谓儒商的企业家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中国毫不例外地陷入现代性困境中。由此，中国企业家面临破坏性创新道德难题。对商业伦理的呼应日益凸显，儒商，就成为一个被关注的概念。金融危机发生，导致人类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对所谓进步的疑问，也引起了对社会精英——企业家的质问。作为回答，西方企业家已无从担当了。靠谁呢？儒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套历经几千年沉淀的儒学体系。从这种理论体系孕育的中国企业家既具有破坏性创新的市场精神，又背负兼善天下的儒家情怀，具有超越新教伦理背景下的西方企业家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们是“市场的”，又是“天下”的。我们是“破坏性创新”的，又是“仁义礼智信”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已无关紧要。

C 到哪里去？“儒商”的归宿

我们完成了原始积累，但财富都是哪里来的？作为受过儒家训练的一代企业家们，在思考这个问题。同时这也是全世界的一个精神问题了，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现代性困境在西方社会是没有出路的，我不认为人类有希望。那么从企业目前的伦理上来说，不可能有出路，为什么？就是竞争，就是“狼性原则”。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在考虑，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企业管理学。

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应该往哪里去。在这儿我就想回到我们探讨的儒商以后的出路问题。现在出现的是世界性的失序，右翼势力的兴起、金融危机、民族冲突、生态危机在世界不同角落不断上演。新教伦理已经不够用了，它再用简单的至善就是挣钱的理论，无法再往前走。为什么？因为要挣钱就要竞争、要竞争就是狼性原则，这个东西在现代社会就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就是要看到启蒙的恶果，启蒙的负面性表现得无限充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人彻底堕落了。所有的人都是贪婪的，华尔街多么贪婪，当然中国的“土豪”也贪婪。普世价值被工具化、被神化。资本主义精神现在走到了一个困境，你的文化是不是唯一的？你是唯一的，你把全世界人类带向深渊，此外，历史是不是一定会终结？前途何在？所以，当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被破除之后，是不是人类存在着一个需要证明的共同指向呢？

我觉得中国的“儒商”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就有责任价值了。在儒家理论、伦理里要注入市场精神。市场，是一个竞争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最能体现自由、平等、民主、正义。一定要有市场，没有市场只有垄断，那只有极权，什么都别想。

新时期的“儒商”已经由杜维明先生定义了，那么应该和能够干些什么呢？我试想：

第一，在儒家理论框架下完成古典主义启蒙任务。

我不认为启蒙完成了，我也不认为我们必须打倒它。我们要承认，商人们过于恐惧和迷信权力，从心里并不承认和相信民主平等，在一个社会普遍寻租的时候，商人是受害者，又是受益者。然而，社会的代价是自由、民主、平等的丧失，社会就分成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有权的人和无权的人，有自由的人和丧失自由的人、高贵的人和低贱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古典主义启蒙任务在中国的当下有必要推行。作为儒商来说，有责任跟这个社会共同建设一个正义的社会结构，避免马克思·韦伯所说的“铁笼现象”的继续出现。那么商人要做到自身人格的维护。既然要讲自由平等、民主正义，你不能再有了钱了，变成土豪了，就官商勾结，不管平民百姓。在这个时代，先保持商人自身的人格尊严，离政治远一点，离权力远一点。这是在古典主义启蒙当中商人自己首先应该体现的。

第二，进行反启蒙的启蒙清理。

我们对过去一定要进行清理。这启蒙对不对？从主题上来说它是对的，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但是，我们要反对启蒙当中带来的恶果的东西。反对理论工具化，警惕宏大叙事神话导致极权现象，从而让市场蜕变为背书，要开始考虑谁被落下了，以及什么被让渡了。从中国当下的现代性困境出发，我们有理由提出来的，我们也深受其害啊。物质这么发达，人的精神都分裂了。我们现在越来越富了，越来越不自由了。整个社会都在抱怨、互相骂，成当下时代

D 结语：儒商是谁？



尼采在1882年2月19日给勃兰克斯的信中说：“您在‘现代性’观念问题上所做的工作，使我得到了最乐于接受的恩惠。因为，说来也巧，今年冬天，我恰恰也正盘旋于这一最主要的

的“时髦”了。为什么？人的心灵失落了，没有地方可去了。那么儒商要做的就是摆脱新教伦理带来的“丛林法则”。不是说你打赢了就是爷，竞争要有度。这个时候要和谐，跟自然要和谐，跟社会要和谐，跟你的竞争对手要和谐。所以，那种断言，那种中国必须补课的启蒙神话迷思是要反对的。

第三，“与上帝和解”，开始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历史新启蒙。

我们把上帝杀死了，我们觉得人了不起，什么都能干，突然发现人比上帝更坏，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都是从德国起来的？实际上，我们要看到，就是因为从尼采呼唤“超人”的出现，到海德格尔的“上帝”的等待，再到马克思·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合法性肯定，然后到熊彼特完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强人——企业家精神的建立，企业家终于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至于走向了金融，操纵社会，导致了一系列大的金融危机。这就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这就是启蒙的恶果，这就是现代性困境。而且这种困境是无解的。如此下去，人类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讲“天人合一”，就是跟上帝和解。中国的儒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到“人”本身来，回到中国的儒家伦理体系来。我们希望最后的结局就是——人要诗意地栖居。儒商要培养自身的贵族气质，回归社会，谦卑自省，与大众和解，最终跟上帝、天理和解。

第四，彰显浪漫主义色彩推使儒家伦理为主导的新时代启蒙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精神。

什么叫浪漫主义？这是我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现代主义走到头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回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生活本来应该那样美好的”，就是“浪漫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要探讨，儒家理论为主导的新时代启蒙。这个当中启蒙对人类精神应该回归到“仁义礼智信”。为什么？我们应该承认存在普世价值，但这个普世价值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表达，用什么样的文化来包容，我们可以探讨。我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能够包容所有自由、公平、公正、民主这些含义的。所以应该回到一个“仁义礼智信”的人性的心灵的东西，“生活本该如此”，这是我们的理想国。

这个时候，儒商能够摆脱“半人半兽”的角色。商人是人，但同时商人也是经济动物，这是马克思说过的。我们最后要涅槃，终成正果，到达彼岸。我们要从“半人半兽”回归到儒商，从儒商摆脱这个困境。

另外，必须补充的是，在儒商的概念考古意义上，可以强调：儒商在肩负市场教化责任的同时，也要批判和反对儒学系统的原教旨主义，因为，极有可能在原教旨主义色彩下，儒家伦理首先被工具化。其实，这也是历经几千年儒学上升为佛教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儒学都被政治化，构成统治天下的法理系统核心了。其次，坚决反对儒家伦理的被神话。需要一种“祛魅”的历史性清理，神话之下是尼采的“末人”，是“劳心者”用以教化“劳力者”的术。再者，一定要看到当下存在儒家伦理被世俗化的倾向。在儒学回归的旗帜下，那种自觉或不自觉甚至是别有用心地以儒家的名义推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的人或行为，都对儒学系统、儒家伦理的回归造成极大伤害，从而酿成历史、民族悲剧。

价值问题之上。我像鸟一样飞翔于高高的天际，盼望能以尽可能非现代性的眼睛考察现代世界的一切。”这个“非现代性的眼睛”特别有意思。我现在在研究佛教。我曾在扎什伦布寺向我的老师请教，我说我们这个社会眼花缭乱，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佛经那么多年了，它不会改吗？我的老师告诉我，永远不会改。突然我就明白了，确实存在一个永远不变的世界的，但我们又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伯特兰·罗素所说的短哲的现代性的世界。尼采为什么说这句话？我认为，他是要回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也就要回到我们儒家理论的探讨，就像圣经一样，一个标准放在那儿，也是不变的。我们现在用不变的理论体系，用这个眼光，回头看看我们这个世界的底是多么肮脏，多么恶心，那么明天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这个意义上，重归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以非现代性的、非功利的历史眼光来解释考察现代世界、现代中国，可能会真的成为儒商在二十一世纪自觉或不自觉的神圣天职。

实际上，要一句总结的话，应该这样说：儒商是具有儒家理论修养及天下情怀，同时具有市场创新精神的熊彼特意义上的二十一世纪企业家，是时代的精英，是社会的稀缺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文明推进具有典范作用。

(黄怒波)